

# 新人文地理学

M. S. 劳, J. R. 萧特

一、引言 《地理学进展》的创刊号于1969年出版,在刊物创刊21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其宗旨和目的再作一次评析。本文将考察进步的概念,让我们先从定义入手。

地理科学的进步,常常被定义为地理学家使他们的研究领域变得更具可知性的能力。像所有社会学科一样,这里存在着下定义的问题。更具知识性和可知性是什么意思?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决定这种进步是什么?学术研究来源于商界和政府 在安排研究项目方面起至关重要且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千世界中,有时用一般的方式,有时则用特殊的方式。当然,这在以前就有人观察过。例如,在介绍英国80年代初有关大学的自主性时,David Smith就曾注意到学术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干预。如今,在强化一个已建立起来的学术方面——通过设置不同的研究项目——学术委员会使这种干预变得更为明显。

我们认为,人文地理学中的进步不是超然于社会影响或政治干预之外的。探求知识是一种政治行为。没有一项研究是不带政治色彩或没有政治价值的、像教师和研究 人员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角色同样受着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这种影响却不必要妥协罢了。

地理学史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关与外部世界的交往。Noam Chomsky 在其“危机时代大学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人们经常呼吁,要求大学要为外部社会的需要服务,即大学的活动要与一般社会事务相关联。从这一角度出发,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反映在实际生活中,则常常是只为现存的社会机构提供服务,这些机构有权明确

分数(图2)与从整个研究区得到的百分数将出现小误差。我们偏向于以典型树的计算结果为基础。

图2可用来确定以不同间距栽植的树木的作用大小,以10米间距栽植、成活率为100%的树木对各处的影响,估计是最小的,在图2中表示在0和5之间的位置。这就假定邻近树木的影响不是叠加的,其影响只受最近树木的制约。按此间距计算,暴雨的破坏至少可被降低70%,研究区免受直接草场损失的面积百分数可达17%。根据在主要暴雨事件中保护的有生产潜力的土地数据,就有可能计算出白杨树对草场长期生产力的长期影响。托马斯(Thomas)和特鲁斯特鲁姆(Trustrum)曾建立了一个模拟模式,计算特定侵蚀事件分布下的草场生产力预计损失。在这个模型中,通过计算避免滑坡的面积和减小模拟的侵蚀事件的严重性可把白杨树的作用包括进去,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

由于土壤变化、地貌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白杨树减小滑坡的作用因地而异。免于发生滑坡的部分可能取决于暴雨强度和土壤侵蚀历史。有更多的地方需要分析研究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了白杨树减少滑坡的效能。我们的研究结果同树木的密植(作为林业或农林业兼用)和每一株树有关。这种研究方法为确定合理的植树间距,保护坡面土壤提供了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略)

李中魁译自《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1988年,11—12月,贾新美校

地提出他们的要求并可为满足其要求提供资助。当大学仅仅是为了满足外界提出的要求时,它们就会轻易地相信自己处于中立无政治色彩的地位。事实上,这样做是政治决策,即表面承认社会上普遍有权力、权威、特权之分,并以加强这种区别为己任。如五角大楼和大公司可以提出他们的要求并资助能够满足其要求的工作。而危地马拉的农民或哈莱姆的失业人员则无权这样做。”

正当地理学似乎被技术手段的条条框框,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统(GIS)所迷惑时,Chomsky的评论是非常中肯的,这不仅仅是由于理智和道德原因,而且也是政治和财政政策的缘故。现在许多地理工作者正在使自己成为受过训练并能处理一系列问题的科技工作者,而不是那些帮助人们认识他们所处世界的教育工作者。地理信息系统是必要的,但我们要问这是谁的地理?是谁的信息?又是谁的系统?我们知道地理学可以获得资助,但以何为代价?我们不能因私人和公共机构的种种事务而忽视公众的利益。

当然,一些地理学家对地理学与外部社会之交往和与社会活动之关联问题是十分敏感的。人文地理学具有多样性的历史表现在象Wittfogel、Reolus和Kropotkin之类的有关历史人物,融入了象Bill Bunge、David Harvey、David Smith和Ron Johnston之类的现代人物的著作中。在这个构成社会影响和社会批评的多样性传统中,一个永恒的论题就是人文地理学的必要性。此文试图提出“地理学为谁”这一根本问题,并为新人文地理学颁发“许可证”。

**二、目的问题** 不论我们是否把当今时代称作“新时期”,或者是无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目前,人们一致认为在各个领域中的根本改革是一种波状过程,而部分或局部的这种重新建构已经引起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变化。这种新模式已被多国合作的行为及民族国家政府的政治追求所加强。

我们认为目前形势的发展也要求地理学重新构建其内容和方法。作为一个整体,在保持其整体性原则下,重构的步伐已经迈出。但在此我们已决意倡导一门新地理学,即“新人文地理学”。我们并不希望开列一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单子,然而,我们确实想提出这一论题供大家讨论。考虑到研究范围很广,我们提议:

**1.人的外貌** 1970年,地理学家Torsten Hägerstrand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区域科学中人是什么?”。问题一直反复出现。1977年,David Smith提出“…地理学的一个新范例,它人文属性的内在本质…关于真实人们的人类地理学,从促进人类自身扩展的意义上说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人类自由献身。”1984年在对英国地理学家协会的讲演中,David Harvey在讲话中重复了这一论题:“…一门人类地理学,不是基于虔诚的普济主义、空幻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而是基于反映现实利益和要求的实实在在的进取精神,反对空论和成见。”这一要求的重中是人文地理学失去人性的结果。人们要么因过分重视结构研究而被忽视,要么丧失在抽象的统计概念中。作为一种矫正,人文学家和现象论者已经开始强调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然而,我们还要问是什么人在什么地理学中起作用?这就有必要对在社会上被社会忽视的人加以分析。这些人只在最近在其自身的研究领域中作为个体研究的价值被认可。但下述情况仍然存在:即考虑妇女特殊要求的地理著作还很少,而其他人在地理学中也更多地被忽视。尽管种族问题和种族主义在Peter Jackson收集编辑的出版物中得到了同情的报导,然而,对青年人、老年人及残疾人或精神病患者仍注意不够。如果把这些人纳入我们的研究中,可能会激发新问题和新的研究方法,而且可说明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过程中许多方面至关重要的问题。

例如,大多数城市似乎只是为某些人而设计的。妇女、儿童、穷人和一般的公民在城市建设中不受重视。Colin Ward 总结道:“城市是为某类特殊的公民——成年人、男人、白领阶层和郊外汽车使用者而存在的。”我们有必要做更详尽的考察,在人文地理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为何某些人的要求被优先考虑,而另一些人则在有意无意间被忽视。象 Bill Bunge 有关底特律市费兹杰拉德区的研究是一项颇有成效的探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城市地理学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范例。

2. 政治 一个更为明确的认识长期未形成,即在构造我们学科内容时,政治起何作用以及地理学在广泛的政治活动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虽然,一些学者对地理学在政治活动中缺乏中心作用已经表示痛惜,但对现时政治在建构我们目前研究的地理学时起的特殊作用仍注意较少。如在分支学科——工业地理学中,许多研究力量集中在“…小型公司和高技术企业的区位行为。工业部门保持产品增长和就业扩大的势头”。换句话说,研究已经与政府的需求密切相关。研究的范围常被时下的政治风气所左右。考虑地理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他情况亦如此。

3. 从地缘政治学到和平政治 构成我们学科不同力量的重要性已通过政治地理学,特别是 Mackinder 与 Kropotkin 的生平和著述得到了很好说明。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7—1947) 出身于中产阶级,是英国地理学发展方面的领头人,成为制定法规的委员会和英国政府的一员。相反, Peter Kropotkin (1842—1921) 出身于沙皇贵族,但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现存秩序的社会评论家。这两人代表了从事人文地理学的两个对立方。一方面,一个统治阶级的奴仆,把他的地理作品看作是“治国之术的帮手”,特别是英帝国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散布无政府主义的观点。Mackinder 发展了有关中心地带的理论,作为政府的理想工具,还认为如果受教育阶级没有丧失对半受教育的无产阶级的控制和影响,那么地理教学是十分必要的。Kropotkin 则称他的相互合作和分散的原理有助于人类解放,并提出与 Mackinder 截然不同的观点:“…早期地理学的任务是激发孩子们对奇妙的自然现象的兴趣,唤起他们去探求和解释这些现象的愿望。另外,地理学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教导人们,不管是什么国籍,我们都是同胞。地理学必须消减敌对影响——这是一种消除偏见和创造更多人情味的手段。”

当地理学遵循 Mackinder 而不是 Kropotkin 所说的去做时,它就开始迷失自己的道路。在政治地理的早期历史中,是 Mackinder 把持场面的历史。政治地理学变成为与政府要求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权术的帮手。今天,如果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寻求全球性的和平秩序,把战争条例转变为和平计划,那么,就应该到 Kropotkin 的理论中而不是 Mackinder 和地缘政治学的说教中,去寻求有效的帮助和历史性的预见。

4. 生态学的警觉 最近几个月表明环境论与生态学早期关系的复兴。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在探寻地理学科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中人们发现了这种关系。但随后几年,环境论和生态学中的概念已经归属到自然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中,或者归属到大学生们热衷研究的环境交叉学科的分支中。人文地理学从已经十分明确的生态关系中分化出来,这在过去是理所当然的,而现在却越来越行不通。尽管现今人们对某些“新”争论中该肯定或该否定的特征有疑虑,但因为“新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是全球关系、民族问题及区域性矛盾,所以,时代给社会和环境带来这种种新问题是十分自然的。我们可以看到沿着这些思路所出现的进步。认为人文地理学已经丧失其环境敏感性,正象环境关系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而重新出现一样,是个令人沮丧的怪论。我们学科的结构中应包括对环境空间和生态空间问题的关注。注重这

些论题的研究,就能为创建一门更加坚实、更加统一的新学科打下基础,并且鼓励人们更深入、更实质性地考察什么是进步这一问题。

5.具有新活力的地理学 目前,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是提高各地区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重要性。与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改革进程相左的新兴力量现正在许多地区形成。具有这些新活力的人文地理学将对一门新人文地理学有巨大的刺激作用。

例如:新人文地理学就象工人的合作生产。对它的研究改变了经济和工业地理中争论的概念,抛开了仅仅在工业企业中增加工作数量和目前政府所提倡的活动形式的局限。合作式的研究使“经济地理”在生产与组织上与现代发展齐头并进。由人们所组成和控制的合作,能在所能提供的工作数量的前提下寻求提高工作质量。并为那些常被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所忽视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而且,许多合作能致力于所属地区的发展,并千方百计保持各自区域的文化和地方特色。因此,合作不仅仅带来了诸如为谁工作,给什么样的工作等问题,而且引起关于人类活动及其空间区位的地理学的许多有关难题。

三、方法问题 人文地理学也需要应用新的方法。要重视近来在地理学中大量出现的新方法。近来刊载的几篇新文章,指导性地说明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过程,而不是一般的和抽象的研究方法,结合小范围内的完善,使之成为学科的主流。我们致力于许多定性的、解释性的,甚至人类学方法的展开研究,以引导精神生活,揭示形形色色的社会区域组织和个人的社会境况。这些方法的应用,不仅对包括在我们研究范围中的人类给予了更多的同情。而且,人类学的本质方法允许我们运用出现在工作中各种各样的新方法。许多地理学家最近坦率地指出,地理学家中的最激进分子提出的所谓“保守组织战略”已被推翻。我们常受数量革命历史遗教的制约。它苛刻地要求每一个还不能称其为地理学家的人完成一门突击课程和一门统计方法概论。当然,这些课程本身是正确的,但它强调运用软件的费用,阻碍了地理学的进步。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人文地理学内有关小型企业的研究,常忽视了人的因素。它的注意力不是直接集中在小型企业中具有心理和社会特征的人。代之的倾向是把就业当作一个抽象体——劳动力的净增或净减。如果不考虑其组成的人的因素,劳力市场和工业企业就毫无意义可言。有许多关于劳力市场和工业企业的刊物和论文,却常常对人这一因素闭口不谈。

许多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在人们的生活和学术理论之间常常出现“断裂”,特别是在地理学中,在社会科学中则更为常见。这种断裂于1977年由Nichols和Beynon发现,当时他们指出:“过去的许多理论与人们生活脱节”,其实,大部分描述性的社会调查常常不能正确反映社会关系结构和人们的情感。我们似乎应运用另外一种写作方式,即某种“还事物本来面目”的方法。这将填平抽象与具体之间的鸿沟。我们期望看到这种灵活的构想能创立并发展起来。

我们怎样着手开展新人文地理学?建议如下:如果运用大量的方法,我们有可能为地理学提供条理清晰的内容,并能对个人和群体的观念、智慧和能力进行敏锐的研究。因此,新人文地理学既不排除也不否认各种构成因素,而是允许有不同的见解和方法。如果我们要驾驭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Gregorg称之为“多视角与多区域战略”就很有必要了。这种战略告诉我们在不同地区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我们的观点还需要拓宽。在人文地理学中,早就有民间和官方共同撰文论述的传统。这在象《国家地理》这类刊物中很明显。但在别的地

# 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与海岸地貌

Heather A. Viles

温室效应引起全球增暖问题目前正受到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政治家和公众的广泛注意。最近的报告表明,对于全球增暖及其影响的确切性质尚不清楚(Schneider, 1989)。然而,海岸带可能是一个关键而敏感的环境地带,全球增暖对海岸地貌会产生一系列后果。尽管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幅度的估计从56厘米到3.45米不等,但一般相差可能在1.44米和2.17米之间(Hoffman等, 1983; Titus, 1987)。这个上升归因于两个主要原因,即海水的热膨胀和冰雪融水的流入海洋。根据Kliege和Dobrovolsky (1988),西南极冰盖的融化将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5—7米。从历史发展观点来确定未来海平面变化,估计今后40年里全球海平面升高幅度将是过去100年上升幅度的2倍(Hoffman等, 1983)。这种平均的全球海平面上升掩盖了由于区域构造、大地水准面和其它因素等造成的空间差异。例如,Emery等(1988)对海平面的研究表明地中海沿岸构造活动显著地影响了相对海平面变化。

最近有几项研究考虑了未来海平面上升将怎样影响海岸带问题(如Barth和Titus, 1984; Bruun, 1986; NRC, 1987),指出主要后果将是岸线的不断后退,海岸侵蚀、洪水泛滥和盐水内侵等的增强。Leatherman (1986)评述了海平面变化对南美海岸线的可能影响,认为海滩的侵蚀在象巴西Copacabana滩这样的地方会进一步恶化,同时滨海湿地面积

方,新闻性的描述是以含沙射影的批评形式出现的。学科的制度化学产生其专业化特征,但常是以封闭学说为代价的。我们必须写得更好一些。在这一点上,也许应该以写作通俗易懂的新闻工作者为榜样。为了消除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隔阂,我们应该采用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一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从学术写作的角度来说,“分析他事”的模式有时必须由“宣传他事”取代。

在我们展开研究之前,还有一些问题要谈。那就是我们必须克服在有关学术写作上个人的失意情绪。采取“多方位的组织战略”,如直接应用采访材料、音像磁带从而得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而不是依靠别人具体化了的理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有意义的时代。世界秩序正在变化,超级大国间竞争的旧的两极结构在我们面前土崩瓦解。关于国家的作用和形式的基本问题被提出来了。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治行动。我们个人的生活也正经历着频繁和急速的变化。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重任在肩,要在这块颇有争议的园地里作出自己的贡献。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应在混乱中制定某种规章制度。作为地理学家,我们更有特殊的责任澄清那些存在于人类和环境、社会 and 空间、结构和个人、太空和地面之间的关系中的错误观点。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人文地理学家引入的“进步”一词的含义必将由他们在人文地理学中重新给予定义。任务是艰巨的,问题是众多的,但我们认为再没有一种设想比建构一门新人文地理学更令人振奋和更富有远见的了。

肖建成摘译自《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0年,第1期,周茂权校